

改革·反改革

康有為與袁世凱

(一)

● 孔祥吉 (大陸旅美學人)

出身書香宦門第

近代改革家康有為(一八五八—一九二七)原名祖詒，字廣廈，號長素，又號更姓；廣東省南海縣人，是晚清有名的今文學家，又以發動「舉國更始」以改觀，外人色動而「悚聽」的戊戌維新而聞名中外。

康有為出身於書香宦門第。祖父贊修，曾任連州訓導；父親達初曾任江西補用知縣。在康氏家族中最顯赫的是其叔祖康國器，長期隨左宗棠在江浙閩粵南征北戰，屢建戰功，頗為左氏器重，官至廣西護理巡撫。由於父母早逝，康有為初從簡鳳儀受經，後則轉赴廣西跟隨祖父贊修學文史，讀書甚多，博聞強記，自幼便慷慨有遠志。

十九歲那年，應廣東鄉試不售，康有為轉到著名學者朱九江門下讀書，他閱讀了大量書籍後，開始閉戶謝客，靜坐養心，感念天下蒼生困苦，於是進入西樵山，居住白雲洞，鑽研佛道經典，以經營天下為志。他還薄遊香港，看到街道整齊，百業興旺，深知

西人治國有法度，於是開始講求西學。

赴京鄉試名落孫山

光緒八年(一八八二)、十四年，康有為兩度赴京應順天鄉試，名落孫山，但他並不灰心，而是上書當道，請求變法，認為：「中國發憤，只有此數年間暇，及時變法，猶可支持；過此不治，後悔莫及。」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一書，可惜不為當道所接受採納。

康氏感嘆曰：「虎豹狎守九關，帝閭沉沉叫不得。」

離開京師後，康有為開始在長興講學授徒，著名學者梁啟超、陳千秋等都來就學，除了講學外，他還潛心著述，撰寫了《新學偽經考》，在學生中傳播孔子改制的理論。

光緒十九年康有為在廣東應鄉試中舉，次年入京會試，以下車傷足，南歸至廣西講學，因為余聯沅等守舊勢力向清朝參劾他宣揚新學偽經之錯誤理論，妖言惑眾，他迫不得已轉赴桂林繼續講學，宣傳改制理論。

公車上書未被採納

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再度赴京會試，考中進士。當時正值甲午戰爭清軍慘敗，李鴻章簽署的馬關條約剛剛送到北京，等候皇帝的劃押認可。條約訂得十分苛刻，中國不但要割地，還要賠鉅款，消息傳出，舉國嘩然。康有為廣泛聯絡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聯名向清廷上書，要求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，遷都定天下之本，練兵強天下之勢，變法成天下之治，廢除賣國條約，憤發雪恥。這就是康氏草擬的公車上書。由於朝廷內部有慈禧、孫毓汶阻撓，公車上書未被採納，但卻開創了知識分子干政的新紀元。因為清廷二百多年不許士人干政上書，否則會株連九族。康有為以愛國的大無畏精神衝破了重重阻撓，演出了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。

緊接著康有為又草擬了上清帝第三書、第四書，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變法主張，建議清廷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，設議院以通下情



①近代改革家康有為。

②向西太后告密的袁世凱，使得百日維新歸於失敗。

③康有為中進士後，連續寫了幾次奏議，均未能上達皇帝面前。

（此為奏議之一）

③請告 天祖 誓羣臣以變法定國是摺
 奏為決行變法請上告

天

祖。大誓羣臣。以定國是而一人心。恭摺仰祈

聖鑒事。竊自東事敗後。近者膠旅繼割。國勢凌夷。瓜分日聞。幾不國矣。所以至于此者。一統閉關之治。與列國競爭之治。若冬夏冰炭之相反。水陸舟車之異宜也。今我國處競爭之新世。而行閉關之舊法。安得不危敗乎。夫救國必捐。當貧無用。五月之裘難披。岸上之船不住。物之公理也。禮以時為大。而孔子時聖。逆天不祥。違時必敗。若當變不變。必有代變之者矣。與其人為變之。何如已自變之。之為安適。夫印度者人

中。他還在京創刊了萬國公報，組織了知識分子參加的京師強學會，後又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強學會。

光緒召見商議變法

德國出兵侵佔膠州灣事件發生後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，康有為赴京匆忙呈遞了上清帝第五書，第六書，由於翁同龢的極力推薦，光緒帝下令總理衙門召見康氏，聽取他的變法建議，並將他撰寫的變法書籍源源不絕地呈送皇帝。為了救亡圖存，康有為還成立了以保國、保種、保教為宗旨的京師保國會，為變法大造輿論。

在康有為等維新派的鼓動下，光緒帝於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頒布明定國是，徹底維新的詔書，並且在五天後召見康氏，商議變法大計。有為建議在宮中設立制度局，選拔改革派人士更張國政。光緒帝則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，君臣相得，有如魚水。

此後，康氏接二連三地呈遞變法奏摺及書籍，光緒帝則依據有為建議頒布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命令。全國上下一片欣欣向榮，棄舊圖新的景象。這些變革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軍事等方面，諸如廢除八股，裁撤冗官，設立新式學堂，向西方學習，發展農工商業等。這是一次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改革，其目的在於使衰弱的中國變為像英美那樣的強國，康有為的奏摺對皇帝有很大啟迪

作用。因此皇帝下令重新抄錄，賜名為傑士上書匯錄，至今仍在故宮珍藏。

政變失敗亡命國外

改革的迅猛進行，嚴重觸犯了頑固派的既得利益，於是他們圍繞在慈禧太后周圍，群起而反對，新舊派矛盾有如水火，空前尖銳。為挽救危局，康有為曾向皇帝保薦袁世凱，並派譚嗣同夜訪袁氏，策動他率兵包圍頤和園，捉拿慈禧及榮祿等頑固守舊人物。不料，袁世凱非但沒有聽從維新派安排，反而向守舊派告密。戊戌八月初四日晚，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由頤和園返回紫禁城，將光緒帝囚禁於瀛臺，宣布廢除新政，下令捉拿康有為及梁啟超，並將譚嗣同等六君子斬首於京師菜市口。

政變發生後，康有為經天津、吳淞亡命國外，發布檄文指斥慈禧大罪十條，堅持改良，反對革命，組織保皇會，義和團運動期間，主張「助外人攻拳匪以救上」。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康氏認為中國祇能行立憲，不可行革命，反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。辛亥革命後，康氏於上海主編不忍雜誌，發表反對共和，保存國粹言論，擔任孔教會會長，參與張勳策動的清帝復辟活動，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病逝山東青島。

新舊兩黨矛盾劇增

戊戌七月下旬，新舊兩黨矛盾激劇衝突

，慈禧、榮祿為首的後舊黨，對新黨的舉措不能容忍。光緒帝根據康有為建議，爭取在宮中設懋勤殿，裁汰冗署，引起守舊勢力不滿。舊黨編造流言蜚語，詆毀光緒帝和康有為，策劃于密室，積極準備發動政變。撲滅新政。康有為動員身邊一切力量，對守舊勢力進行回擊。康有為所採取的措施，非常錯誤，未能有效地遏止舊黨的行動，反加速政變的到來。

開放言路是維新派的主張。康有為在變法奏議中，屢次強調應鼓勵士民上書，採納天下輿論。「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」。「派御史為監收，許天下人上書，皆與傳達，發下制度局議之，以通天下之情，盡天下之才。或與召見，稱旨者擢用，或擢入制度局參議」。百日維新開始後，康有為多次要求「開放言路，廣集眾議，博採輿論」，天下之事甚多，絕非少數人之聰明才力可以勝任，更不是「一二老臣，精力既衰，學問甚舊之人所能辦」。

封建制度耆老昏庸

封建皇帝為鞏固統治地位，千方百計地箝制言論自由，清代，上書格式極嚴，「除督撫卿貳台諫數十人外，無能遞摺上言者，即叩閣亦不能遞」。對國家大事，只有少數人有發言權，清政府規定，一般士民上書只能經由都察院代遞，都察院在代遞之前，有種種嚴格限制，漢人必須有同鄉京官之印結

①



②光緒帝被幽禁處——瀛台。
①百日維新時的光緒皇帝。



②

；滿人必須隨帶佐領發下的圖片，印結與圖片的取得非常不容易，花費大量銀兩，還會屢遭責難。「八旗佐領少見多怪，畏事喜功，微末士人，有為條陳取具圖片者，白眼阻格，在所不免」。經由都察院代奏者，有名無實，少得極為可憐。那些有上奏之權的督擾卿貳，累數十年資格而後至，耆老昏庸，因循守舊，皇帝所能聽到的皆是「守舊愚陋之談」。政治上的不民主，造成中國落後。維新派反復上書，爭取言論和結社的自由，切中時弊。

但是，由於光緒地位軟弱，他明詔敦促中外大小臣工力言新政，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，由各堂官代奏，士民則赴都察院呈遞，「毋得拘牽忌諱，稍有阻格」。守舊大臣不予理會，終於發生了禮部阻撓王照上書事件。

王照上書引起衝突

王照，字小航，直隸寧河人，光緒甲午進士，由庶吉士改官禮部主事，「治事有能名」，與維新派頗多往還。戊戌七月初五（八月廿一日），王照響應光緒帝鼓勵臣工昌言新政的詔令，在禮部上書條陳三事：一、請旨宣示削亡之禍，已在目前。指責守舊派「視改舊章為傷元氣，倡新政為啟亂萌」，以空談正學術為純臣，以致新法難以推行；二、請皇上奉太后巡幸中外，先自日本始，設體太后之意而變法；三、尊孔子為國教，設

立教部，專門討論經術，維繫綱常，以正人心風俗，學堂則以學課為主，宜另立學部統轄。

王照上書在於調和光緒帝與慈禧之間的關係。他認為守舊者皆陰持太后，以阻撓新政，而太后早年「原喜變法，後因不得干政，陰結頑固諸老，為權利之計。為皇上計，仍以變法之名歸諸太后，則皇上之志可伸，頑固黨失其倚賴。張蔭桓為皇上謀，與此意相反；南海祖張，謂撤簾已久之太后，不容再出……余如梗在喉，非言不可；故假藉游歷外邦之大題目，此出架空之論……而調和之術行乎其中」。

守舊派對王照的調和之術不滿意。禮部堂官懷塔布、許應騤等，「擲還王折，不肯代遞」，於是堂司交哄。王照上書劾堂官公然違旨阻撓上書，懷塔布遞摺稱王照「條陳時務，藉端挾制」。在衝突中，光緒站在維新派一邊，認為朝廷廣開言路，本期明目達聰，邇言必察，誠以是非得失，朕心自有權衡，無煩該堂官等鯁鯁過慮。下令將懷塔布等六人全部交部議處。

王照上書引起衝突是維新派與守舊派矛盾長期衍化的結果。根據康有為《自編年譜》的，王照的過激行動在康廣仁的鼓動下才採取的。因五月初二（六月廿日）御史宋伯魯與楊深秀聯名彈劾許應騤守舊迂謬，阻撓新政的奏摺，是康有為鼓動而上的。蘇繼祖對其中原委頗有揭示，謂：「尚書許公與康樹

敵，曾劾康，康又使人劾許，互相攻訐，今王照所言，大都維新之道，正觸其惡，不欲代奏；王為康友，素知許與新黨為難，面斥其背旨，雍蔽言路，復具一摺劾之。」可見王照事件反映正是康有為與許應騤間的宿怨與衝突。這一事件的發生，激化了新舊兩黨的矛盾，加劇了彼此間的衝突。梁啟超對光緒帝罷黜禮部六堂官上諭所加按語指出：「禮部全堂即斥，守舊大臣皆怒，至是感懷震動之心，榮祿亦懼不免，於是禍變促矣。」可見，光緒帝的舉動，帶來後果十分嚴重。

袁世凱參加強學會

在新舊兩黨對立中，康有為深感光緒勢薄力單，沒有掌握兵權，不足對付守舊勢力的襲擊，憂心忡忡，康《自編年譜》記曰：「是時以天津閱兵期迫，收兵權則恐警覺，不撫將帥則恐不及事，日夜憂危。吾於是連日草請仿日本立參謀本部，選天下虎熊之士，不二心之臣於左右，上親擐甲胄而統之。」康有為首先想到袁世凱。推荐袁世凱是百日維新期間的一件大事，與戊戌變法的成敗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，故此事之原委不可不辨析清楚。

袁世凱，字慰亭，河南項城人。父保慶，官江南鹽巡道，為項城地方世族。袁世凱「少恣縱，吳重熹守陳州，考試技前茅，得入邑庠，旋以資為中書」。光緒八年（一八

八二年）隨吳長慶督兵赴朝鮮，以功推同知。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，由於李鴻章的推荐，奉旨以道員升用，加三品銜，駐朝鮮總理交涉商務事宜。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朝鮮東學黨舉事，李鴻章電總署召袁回國，適逢中日戰爭爆發，袁得浙江溫處道實缺，滯留京師，遲不赴任。袁與維新派相交，亦在此時。康有為與梁啟超在京師成立強學會，袁世凱為發起人之一，並捐多金入會，與維新派關係十分密切。

論者由袁世凱後來的表現，推論其早期與康梁等人交往，為偽裝維新，將其參加強學會等活動，稱為投機行爲，虛假地贊成變法。其實這評價並不確切。

因時變通贊成變法

袁世凱長期居留朝鮮，對外洋情形了解較真切。《馬關條約》簽署後，康、梁倡言變法維新，袁世凱不甘落後。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（一八九五年八月二日）光緒帝召見袁世凱，命其條陳變法事宜。袁氏條陳於七月一日（八月廿日）遞上，此條陳由清檔中檢出，無疑表明袁世凱當時對變法維新態度的最佳見證。條陳開頭即稱：

「竊維天下大勢，遞變而不窮者也。變局之來，惟變法以應，則事變乃消弭於無形。此次軍興失利，勢誠岌岌，然果能中外一心，不忘仇恥，破除積習，因時變通，不過十數年間，而富強可期，是亦更始之一大轉

機也。」

「願說者謂：我國聲名文物，遠駕他邦，何必捨己從人，輕更古制？不知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，自應恪守我法，而富國強兵之道，彼已久著成效，勢不得不參用各國新法，擇善而從。試觀三代之際，行井田，設封建，秦漢而後，農政鈔法，兵律官制，迭經更易，降至今日，舊制所存者，百難一舉。以漢宋大儒名臣，亦不能強違時勢，追復三代成規，蓋因時制宜，人心運會，有必不能相沿者也。」

袁世凱講得非常明白痛切，他是衷心地贊成變法的，他不羨慕三代成規，而主張因時變通，並認為這是富國強兵的重要途徑。這些論說與康有為當時的一些變法奏議比較起來並不遜色。

袁世凱對於當時流行與俄國結盟的傾向，亦表示反對。由於《馬關條約》簽署後，俄國出面，邀約德、法共同干預，強迫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，在中國官紳中間出現了與俄國結盟的呼聲。袁世凱認為：

「歷觀中外各國交涉情形，萬國公法，指勢力相均者言之；兩國條約，為承平無事時言之；強鄰奧援，又為彼圖自利者言之。處今日之勢，欲彌衅端杜外侮，舍極求富強之道，詎有他策？且萬國君臣，莫不互引治法，力圖振興，精益求精，孜孜不已。而我猶蹈常習故，孑然默處於五洲之中，風氣隔閡，制勝無術，具繁庶之資，而甘居貧弱如

病者，以孱軀而搏狼虎，欲求倖免，曷可得乎？」

袁世凱認定，欲消彌外侮，只能靠變法圖強，不能依賴與外國結盟。這比當時一些封疆大吏高明許多，其原因就在於他見聞廣博能洞見本原。

建議京師設立館院

袁世凱當時提出以日本為變法的榜樣，並言及外國公卿出洋遊歷問題。他說：

「說者又謂，用夷變夏，古有明訓，縉紳子弟，恥與彼族共周旋，不知通商開禁以來，門戶洞啟，即欲閉守，亦無善道，既不能不與各國交際往來，自必須習知其風土人情，始可相機制服，不為欺侮，猶之知物性者，雖猛虎毒蛇，亦可訓而養之；不知物性者，雖犬馬牛羊，亦不免觸噬之患。近來海外各國王子公卿每多出外遊歷，並學習他國語言文字，無他，亦以備兩國有事，為折衝樽俎，指揮籌用耳。」

「日本幅員僅敵我兩省之地，我則十數倍之，彼之所以勝者，由於講求西法，實力推行；我之所以敗者，由於拘守舊規，罔思改轍。殷鑒不遠，亟宜更張。以我之地大物博，但求日人所以制勝之故，而事半行之，必將雄視海內，強鄰悚息。」

甲午戰後袁世凱所遞的這一條陳，規模宏偉，條理燦然，涉及到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外交等的改革，洋洋一萬三千餘言

，共分爲儲材九條，理財九條，練兵十二條，交涉四條，與康有為的《公車上書》有異曲同工之效。

袁世凱第一具體建議在京師設立館院。館院的人選「由六部九卿，翰詹科道諸衙門內精選品學敦實及留心時務之員，以入其中，並羅致各省有用之才，與之同處。延請精通各種學問西師數人，與之切磋；更令在外洋之華人，周旋介紹，優以廩餼，隆以禮貌，略仿同文館之例而擴充之。簡派親王大臣督領其事，並設提調總辦，司事支發，巡查各館，斟酌於中國書院、外國學堂之間，分天算、輿地、製造、機器……及各國條約、律例、史事、語言文字各門，各就學之所習，性之所近，分隸各處，互相考證，日察之，月省之，歲計之，……俾各努力自好，期底于成。每遇樞譯各處關係國計民生利害大端，交各員分條妥議，折衷至當，」以備採擇。可見，這裡所謂的館院，既類似於書院，又類似於議事機構，其目的是「集衆人之思慮以施政，羅天下之才智以救時」，使國家的措施無乖誤，因應咸得宜。並且在辦出成效之後，向各省推廣。這與康有為在《公車上書》中所建議的選舉議郎，「皇上開武英殿廣懸圖書，俾輪班入值，以備顧問」，雖性質不同，但在集衆才以議事這一點上卻不乏相似之處。

徐仁祿游說袁世凱

總的看來，袁世凱在甲午戰後，是傾向變法維新的，其對於西法的了解，並不在康有為之下。袁世凱對變法的贊同，來自於袁氏對中國在世界上所處地位的了解，故深感列強「蠶食生心，逼處日近」，「駸駸圖我，決無廢心」，與外國相比較，不變法則不能自存，不採擇西法則不能致富強。因此，他「刻以國恥時艱爲念」，亟思補救，這正是袁世凱在京師成立強學會期間能和維新派相接近的思想基礎，捨此即不可能理解，爲什麼康有為向光緒帝推荐「天下虎熊之士，不二心之臣」，首先就想到了袁世凱。事實上，早在荐袁之前，康有為也曾設想過取得聶士成軍隊的支持。王照《方家園雜錄》二十首並記事「一文中曾說：『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，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、徐榮甫一子靜名致靖，瑩甫子靜次子仁鏡也。』」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亭處，先徵同意，然後召其入謁，且許聶以總督直隸。余始終堅辭，曾有王小航不作范雎語。迨至召袁之詔下，霹靂一聲，明是掩耳盜鈴，敗局已定矣。世人或議世凱負心，殊不知即召聶、召董，亦無不敗。……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：『爾如此怕事，乃是爲身家計也。受皇上大恩，不趁此圖報，尚爲身家計，於心安乎？』余曰：『我以爲拉皇上去冒險，心更不安，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。』」

隨著新舊兩黨對峙的形勢越來越緊張，康有為便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袁世凱身上。他認爲袁氏夙駐朝鮮，贊同變法，又一起開過京師強學會，「知其人與董（福祥）、聶（士成）一武夫迥異，擁兵權，可救上者，只此一人」。然而，對於袁世凱與榮祿之間的關係，康有為亦曾有過顧慮，擔心其爲榮祿用，不肯從命。因此，早在戊戌六月間，康有為即派徐仁祿（毅甫）到天津小站兵營對袁世凱進行游說，「遊其幕，與之狎，以觀其情」，並得出了「袁傾向我甚至」的結論。袁世凱甚至稱康有為具有「悲天憫人之心，經天緯地之才」。徐仁祿「以詞激之，謂：『我與卓如、芝棟、復生，屢奏荐於上，上言榮祿謂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用。不知公何爲與榮不洽？』袁恍然悟曰：『昔常熟欲增我兵，榮祿謂漢人不能任握大兵權，常熟曰，曾、左亦漢人，何嘗不能任大兵？榮祿卒不肯增也。』毅甫歸告，知袁爲我所動，決策荐之，於是事急矣」。

袁榮勾結影響政局

對於康有為派徐仁祿游說袁世凱的情形，王照所述與康氏《自編年譜》的記載有明顯不同。王氏謂：「往小站徵袁同意者，爲子靜之侄義甫，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，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（指徐世昌），所徵得者模稜語耳。夫以死生成敗關頭，而敢應以模稜語，是操縱之術，已蓄於心矣。」

這兩種記載雖然細節頗有差異，但是，康有為派人遊說袁世凱這件事是確有其事的。而且，以情理推論，像袁世凱這樣「熱中賦性」，不甘「鬱鬱久居」之人，爲了求得高升，逢人說人話，遇鬼說鬼話也是完全可能的。康有為正是被袁世凱的花言巧語所迷惑，才孤注一擲地將希望完全寄托於袁世凱。康有為這種在關鍵時刻，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，輕信於人的舉動，不僅給變法運動帶來很大的危害，而且給晚近中國歷史釀造了無窮的禍患。其實，袁世凱與榮祿關係至爲密切，遠非世人所能知曉。袁、榮之交對晚近以來的政局影響至深，故對其淵源，不可不稍事追溯。

衆所周知，袁世凱之所以能去小站訓練新軍，主要是依靠了軍機大臣與督辦軍務大臣李鴻藻的推許。而在此之先，張佩綸曾致函李鴻藻，指出：「合肥託大釀成此禍（指甲午之役），諸將已伏其辜。而禍端萌自袁世凱，熾於盛宣懷，結於李經方。儀老（指李鴻章）稍有明機，爲此三人蠱惑，更成糊塗。小李（經方）賣父誤國，天地不容，自己終身廢棄；盛（宣懷）亦累經彈劾，雖有大力芘之，終爲財色冥殛，獨袁（世凱）以罪魁禍首，而公論以爲奇才，直不可解。花房之役，攘吳長慶功，此不足論。雖曰欲尊中朝，而一味鋪張苛刻，視朝鮮如奴，並視日本如蟻，怨毒已深，冥然罔覺。土匪之起，即倭所使，電稟日數十至，清兵往剿。……

：求翼長不遂，與葉（志超）爭忿不相見，指牙山使之屯劄，致入絕地。既回津門，所與合肥論者，皆無甚高論嘉謨；而與盛騰書都下，各表所見，均系事後諸葛，實則全無影響。……都下諸公，主持清議，皆呆人也。袁乃子久從侄，於黃執禮甚恭，且推子久舊交；亦何取雌黃後進？弟對此公與之深談數次，大言不慚，全無實際；而究其所爲，驕奢淫佚，陰賊險狠，無一不備。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則可，以天下奇才目之，則萬萬不可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，既已誤合肥矣，更

恐誤國，更恐誤公，與之實有恩而無怨也。
張佩綸，字幼樵，一字繩庵，又字贊齋，直隸豐潤人。原係清流中之佼佼者，後入李鴻章幕，與李鴻藻淵源甚深，無話不談。其所謂袁世凱敗壞朝事，沾名釣譽，驕奢淫佚，陰賊險狠，真可謂一針見血，洞見本原。通觀張氏所論，雖不無爲李合肥開脫之嫌，但其對袁世凱的評說無疑慧眼獨具，頗有先見之明，可嘆的是李鴻藻竟不爲所動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之二十二
同光風雲錄
邵鏡人教授著
定價台幣 180 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。